

划分三个世界的战略思想是怎样提出来的

□ 孙艳玲

20 世纪 70 年代，国际局势风云变幻，中国的对外关系也出现了新的局面。1974 年，毛泽东对国际格局作出新的判断，提出了关于划分三个世界的战略思想。

从一个“中间地带”到“两个中间地带”

划分三个世界的战略思想，蕴含着对国际格局的深刻思考和长期探索，它来源于“中间地带”的理论。

关于国际格局的划分，毛泽东最早提出的是一个“中间地带”的理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苏关系恶化，国共全面内战爆发，毛泽东原先设想的通过和平民主的方式使中国走上新民主主义道路已无可能。在形势转换的关键时刻，毛泽东于 1946 年夏提出了“两个阵营”、一个“中间地带”的理论。他认为，战后世界分为以社会主义苏联为首的和平民主阵营和以美国帝国主义势力为首的反动阵营；在美苏之间隔着一个辽阔的中间地带，由欧、亚、非三洲的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构成，战后世界面临的现实问题是美国力图控制和侵略包括中国在内的中间地带国家。这一理论对各种国际政治势力作出独具特色的划分，指明了中国在国际上所处的地位，明确了中国革命在国际上的敌友关系。此后，在中国革命即将胜利的时候，这一理论自然地引出了向社会主义苏联“一边倒”的结论。

此后，随着国际形势和周边环境的变化，毛泽东又提出了“两个中间地带”的战略。20 世纪 60 年代初，国际上亚非拉国家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的运动不断高涨，资本主义世界的内部矛盾也在持续发展。从中国对外关系来看，中美关系持续紧张，中苏关系也濒临破裂。1963 年底至 1964 年初，毛泽东提出了争取“两个中间地带”的战略。他将

“中间地带”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指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广大不发达国家，另一部分指除美国以外的资本主义国家和东欧各国。毛泽东指出，这两部分都反对美国的控制，东欧各国则存在反对苏联控制的问题。毛泽东认为，在与美苏两大国对抗的过程中，中国应该尽可能地联合这两个中间地带。“两个中间地带”的战略，在某种程度上缓解了中国的外部压力。1964 年，中法两国突破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不同的障碍，正式建立外交关系。这一时期，中国同非洲和阿拉伯国家的关系也有了重要发展。

中美关系的变化引起了连锁反应

20 世纪 70 年代初，中、美、苏三方关系的基础发生重要变化，世界向多极发展的趋向逐渐显露，毛泽东开始再度审视新的国际格局和中国的对外关系，并提出了“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

60 年代末起，国际格局开始出现新的变化。首先，美苏力量对比发生变化，由美国占优势转变为均势，美国在西方盟友中的地位也有所削弱。其次，西欧和日本逐渐复兴，东欧国家对苏联的离心倾向也不断发展。再次，中国逐渐成为国际舞台上一支独立的重要政治力量，其他亚非拉国家的力量和影响也有了进一步增长。这一时期，中国的对外关系更是发生了重大变化，一方面，1969 年发生的中苏边境冲突及此后苏联的核威胁，让毛泽东深感国家安全问题的严重性。另一方面，中美出于对各自国家安全的考虑，开始缓和双方关系。1971 年春，“乒乓外交”拉开了中美关系走向缓和的序幕。次年 2 月，尼克松总统访问北京，中美和解的进程启动了。1971 年 10 月，第二十六届联合国大会通过了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决议，接着又出现了各国与中国建交的高潮。随着中美关系的缓和，苏联成

为对中国最大的和最直接的威胁。1973 年，毛泽东提出“一条线”“一大片”的战略设想，希望建立一条从日本经过欧洲一直到美国的统一战线。

随着国际局势和中国对外关系的迅速发展，毛泽东提出了划分三个世界的战略思想。1974 年 2 月，毛泽东在同赞比亚总统卡翁达谈话时初次提出关于划分三个世界的战略思想。他指出：“我看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中间派，日本、欧洲、澳大利亚、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们是第三世界。”他还说：“第三世界人口很多。亚洲除了日本，都是第三世界。整个非洲都是第三世界，拉丁美洲也是第三世界。”根据毛泽东的划分，中国属于第三世界，要加强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争取与第二世界国家的联合；在第一世界两个超级大国之中，主要发展与美国的关系，集中力量反对苏联的霸权主义。

1974 年 4 月 6 日，根据毛泽东的提议，邓小平率中国代表团出席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导人首次出席联合国会议，受到全世界的普遍关注。10 日，邓小平在大会发言中，全面阐述了毛泽东关于划分三个世界的战略思想和中国的对外政策。他强调：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也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属于第三世界。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坚决支持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发展民族经济，反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斗争。中国现在不是，将来也不做超级大国。这实际上重新定位了中国的国际角色，进一步明确了中国相应的国际责任。

与 60 年代的“两个中间地带”战略相比，三个世界的战略思想最明显的不同是把苏联放到与美国同一个层次来对待。这一转变是基于中美苏三国关系的变化，联合对中国威胁较小的一方，集中力量防范中国的主要威胁。从思想方法上

看，划分三个世界的标准已不再按阶级与社会的性质，而主要是按综合国力，它让人们能够清楚地看到世界各国在国际政治关系和经济关系中所处的地位。

拓展了中国外交活动的舞台

划分三个世界的战略思想是毛泽东长期深思熟虑的结果，对于中国对外战略和对外关系，有着重要的意义和深远的影響。

划分三个世界的战略思想是基于毛泽东对国际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国际格局的准确认识，它浸透了毛泽东长期进行国际斗争的政治经验，是毛泽东统一战线理论在新的形势下的发展。划分三个世界的战略思想揭示了当时世界形势发展的主要特点、世界各国实力对比的基本格局，从历史、现实和战略的意义上确定了中国国际地位及战略目标。这一思想长期成为中国对外战略的理论基础和主要依据，它的作用和影响一直持续至苏联解体、两极对峙消失和国际原有格局整体改变时为止。

在毛泽东划分三个世界的战略思想指导下，中国的外交工作取得了全面的突破性进展。中国突破“两个阵营”的模式，实行“一条线”“一大片”的方针，坚持反对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和战争威胁，努力推动中美关系实现正常化，积极改善与第二世界国家的关系，大力发展同第三世界各国以及其他类型国家的友好合作。从 1970 年至 1976 年，中国相继同 61 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同中国建交的国家达到 110 多个，其中包含了当时世界上大多数国家。这彻底打破了长期以来中国被孤立、被遏制所形成的外交僵局，中国的国际环境得到极大改善，中国外交活动的范围获得相当大的扩展。同时，这也保证了不久以后中国能够顺利地实行改革开放并更加广泛地参与国际事务。



东北抗日联军三路军三支队烈士纪念碑广场坐落在黑龙江大兴安岭地区松岭区小杨气镇，占地 6300 平方米，中央矗立着一座纪念碑。1985 年，为纪念三支队将士在库楚河战役中打击日寇、血染苍山的壮举，黑龙江省人民政府、黑龙江省军区于纪念抗日战争胜利 40 周年之际奠基，1986 年特立此碑。碑体高 14 米，象征着中华民族 14 年英勇抗战，黑龙江省委原副书记、省长陈雷亲笔题书“东北抗日联军三路军三支队烈士纪念碑”碑名。纪念碑北侧建有一座烈士英名墙，长 37 米，高 4.5 米，墙正中镌刻着牺牲烈士的英名，两侧浮雕展现了抗联将士在冰天雪地、林海雪原英勇杀敌的场面，墙背面刻有碑文，全文如下：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杀我人民，掠我财富，三千万骨肉同胞陷入深重灾难之中。值此国难当头，中国共产党领导东北抗日联军，高举义旗，团结各族人民，奋战在白山黑水之间，展开了波澜壮阔的抗日游击战争。

一九四一年夏至一九四二年春，抗联三路军三支队在王明贵、王钧、陈雷率领下，转战于大兴安岭南麓中东铁路以北广大地区，发动群众，痛击控制金矿和木营的日伪军，英勇善战，威震塞北。尤其库楚河战役，三支队抗日健儿浴血奋战，给日寇以沉重打击，我百余名抗联战士为国捐躯，血染苍山草木，忠骨埋于雪野。誓驱马革，气若长虹。为缅怀先烈献身革命，特建此碑，永志其丰功伟绩。谨以教育后人继承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为祖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贡献力量。

黑龙江省人民政府
黑龙江省军区
一九八六年十月六日

碑文记录了东北抗联三路军三支队在大兴安岭南麓光荣的战斗史，深情缅怀了在库楚河战役中英勇牺牲的百余名革命先烈，寄托了无限哀思。敬读碑文，缅怀先烈，铭记历史，催人奋进。

一支英雄的队伍——东北抗联三路军三支队

1931 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者在不到半年内占领了东三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不愿当亡国奴的东北各族人民和东北军部分爱国官兵，纷纷组建抗日武装，在白山黑水间用血与火奋起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书写了抗日战争史上的不朽篇章。1936 年初，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制定了《为建立全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部决议草案》。杨靖宇、王德泰、赵尚志、李延禄、周保中等和汤原游击队、海伦游击队联名发表《东北抗日联军统一军队建制宣言》，东北各地抗日武装陆续改编建立了东北抗日联军 11 个军。东北抗日联军在南起长白山、北抵小兴安岭、东起乌苏里江、西至辽河东岸的广大地区进行了大规模游击战争，牵制着日军大量兵力，打击了日本在中国东北的殖民统治，有力地配合了全国抗战。根据对敌斗争形势，为更利于配合作战、统一行动，东北抗联根据党中央指示，先后将 11 个军编成一路军、二路军、三路军。

1939 年 5 月 30 日，东北抗日联军三路军在黑龙江德都县朝阳山正式宣布成立，李兆麟任总指挥，冯仲云任政治委员，下辖第三、六、九、十一军。1940 年 4 月，根据伯力会议精神，上述四个军改编为第三、六、九、十二支队。第三支队由东北抗日联军第六军教导队及第一师第十团等

库楚河畔埋忠骨

——东北抗日联军三路军三支队烈士纪念碑碑文敬读

□ 马晓梅

部 100 余人组成。王明贵任第三支队支队长，赵敬夫任政治委员，王钧任参谋长。

1940 年 5 月，三支队取得了攻打讷河县湖山镇等一系列胜利，被评为三路军的优胜单位。9 月，三支队与九支队联合发动克山战役，攻占了克山县城，打破了日本人“铁打的满洲国，模范的克山县”的狂妄神话，成为我军经典战例之一。10 月，三路军总指挥部派三支队远征呼伦贝尔开辟游击区。5 至 10 月间，三支队历经大小战斗 30 余次，转战千余里，数十名指战员血洒疆场。

1941 年 7 月，三支队再次远征呼伦贝尔。在 8 个月时间里，三支队横扫中东铁路和大兴安岭东西两麓，攻占宝吉等金矿，消灭日伪军数百人，缴获了大量枪支弹药、马匹粮食，给日寇以沉重打击。

东北抗联三路军三支队将士不仅要与残暴的侵略者进行殊死战斗，还面临极端恶劣的自然环境和匮乏的物资。部队因冻、饿、病而牺牲的人数不亚于战斗减员。指战员毫不畏缩，以不屈不挠的钢铁意志，转战于嫩西平原、兴安之巅。毛泽东评价：东北抗联的斗争比长征还要艰苦。

一场悲壮的战役——血战库楚河

1942 年 1 月下旬，日本关东军调集 2 万余人进行疯狂“围剿”。2 月初，三支队在余庆老沟遭到日军铃木喜一“讨伐队”袭击，20 名战士牺牲，部队只剩下 130 余人。为避开敌人的锋芒，三支队决定翻越伊勒呼里山，返回嫩江平原开展游击战斗。

2 月 13 日拂晓时分，三支队到达库楚河边的山坳，被早已埋伏在那里的敌人从东、南、西三面包围。战斗异常惨烈，持续了一整天，102 名战士阵亡，25 名战士突出重围，其中有 11 名伤员。激战中，宣传科长陈雷的右手动脉被打断，鲜血喷射，李长德用树枝将纱布硬顶进血管断裂处，止住了血喷。这时，陈雷的后颈部再次被击中，李长德腹部中弹，肠子流了出来，仍然坚持战斗。七大队大队长任德福手臂、肋部多处负伤，无法站立，卧在地上指挥战斗。贺荣的喉咙被子弹打穿，流出来的血冻成了冰。一个又一个战士倒下去，烈士们的鲜血染透了雪原。

为保存力量，三支队放弃南下嫩江平原的计划，决定北上。支队长召集幸存战士，带领部队向南瓮河方向转移，途中多次遭遇敌人围追堵截。2 月 26 日凌晨，王明贵、陈雷带领仅剩的 11 人，从呼玛县的旺哈达越过边境进入苏联。

库楚河一战是东北抗日联军历史上最悲壮的一页，百余名抗联指战员为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挽救苦难的中华民族，浴血奋战、英勇捐躯，在巍巍的大兴安岭上树立起了一座永远的丰碑。

沂蒙革命根据地如何改善民生

□ 王春玲

沂蒙革命根据地，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初期创建的全国著名的革命根据地之一。抗日战争时期，山东省党、政、军领导机关和鲁中、鲁南、滨海三大战略区的领导机关曾长期驻扎在这一地区。解放战争时期，华东、山东和鲁中南行政区的党、政、军领导机关均驻扎于此，使之成为山东乃至华东解放区的首府，被誉为“山东的小延安”。从 1939 年 7 月创立至新中国成立 10 年间，沂蒙革命根据地在保障和改善民生方面持续探索，为建立起战斗力强大的人民军队、支撑山东抗战局面、支援兄弟根据地、孕育沂蒙精神，均作出了巨大贡献。

增强政治引领。据《临沂地方志》记载，新中国成立前有名的土匪在沂蒙地区就有 50 股之多，整个沂蒙山区社会混乱，乌烟瘴气，民不聊生。1937 年 10 月，日军入侵山东后，开始对山东军民进行惨无人道的烧杀掠夺。1938 年 4 月，日军连续 10 天屠杀临沂城，被杀害的群众就达 3000 多人。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日伪军更是对沂蒙根据地发动了空前残酷的反复大“扫荡”。在内有匪患横行外有日寇入侵的恶劣环境下，沂蒙地区村落凋零、田野荒芜，灾难深重的沂蒙人民长期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以王尽美、李清漪、刘晓浦等为代表的沂蒙早期共产党员，在沂蒙大地上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全民抗战爆发后，我党积极宣传全面抗战的思想主张，

在根据地领导群众开展革命斗争，使广大沂蒙群众明白了革命的道理，看到了翻身解放的希望，对共产党的政治信仰、政治理念、政治品格产生了强烈的认同，自觉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开展减租减息和土地改革运动。沂蒙革命根据地建立前，沂蒙人民受封建势力的残酷剥削与压迫由来已久，生活极端贫困。抗战前的沂蒙农村，约 3.5% 的地主占有 45.8% 的耕地，而 70.5% 的贫雇农仅占有土地的 18.4%。地主除了出租土地、雇佣工人剥削农民之外，还通过放高利贷残酷盘剥贫苦农民，大部分农民辛勤劳作却缺衣少食，生活极度贫困。为使广大沂蒙人民摆脱受剥削、受压迫的苦难，中国共产党人以高度的使命感责任感，从 1940 年开始组织群众广泛开展减租减息运动，减轻地主对农民的剥削，改善雇农待遇。在很短的时间内，沂蒙根据地就有 75% 以上的村实行了“双减”，人民群众的生活大得到了改善。1946 年，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沂蒙根据地广泛开展了土地改革，把没收的地主土地分给无地的农民，实现了耕者有其田。土地改革让沂蒙广大劳苦大众拥有了自己的土地，实现了翻身解放的梦想，得到了实实在在的经济利益，从而从内心深处更加感激拥护党和人民军队，筑牢了沂蒙精神产生和发展的群众根基。

发展教育事业。在沂蒙根据地抗日民主政权建立后，为了让沂蒙人民提高政治、文化水平，沂蒙根

据地各级党组织和抗日民主政府大力兴办教育事业。在根据地财力十分紧张的情况下，拨出专项经费普遍开办抗日小学，让穷人的孩子都能够免费读书。竭尽所能兴办中学、师范学校，为根据地建设培育大批人才。在发展正规教育的同时，各级党组织在各村办起夜校、冬学、民校、读报组、识字班等，出现了“村村办学，户户读书”的生动景象。据 1941 年 3 月的《大众日报》记载，当时仅鲁中沂蒙区就有冬学 600 处、学员 18462 人，识字班 225 处、学员 4500 多人。教育事业的发展，提高了群众的思想政治水平，特别是让沂蒙广大妇女的精神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自身素质有了很大的提高。翻身解放后的妇女迅速团结起来，成为党组织、妇救会的得力助手，在拥军支前、动员参军、生产劳动中发挥了重大作用，涌现出了沂蒙红嫂等先进典型群体。

开展卫生防疫。革命战争时期，由于长期处于战争和动乱状态，沂蒙地区的医疗卫生事业发展十分缓慢。抗日战争爆发后，在日本侵略者的摧残下，沂蒙地区原本就落后的卫生事业更是遭到毁灭性的打击，私立中医堂铺、西医教会医院、私人医院及诊所所有的关闭，有的毁于战火，沂蒙地区缺医少药的状况更趋严重。加之沂蒙地区广大农村传染病不断发生、蔓延，严重危害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为保障人民生命健康安全，沂蒙根据地积极开展卫生防疫工作。

在经费极为困难的情况下，抗日民主政府拨出专项经费，历尽艰难万险从敌占区购买疫苗、药品，千方百计挽救群众生命。据记载，仅 1934 年至 1944 年 10 年间，沂蒙地区的抗日民主政府为预防天花支付的种痘经费就达 190 多万元（北海币），在滨海区接受种痘的儿童共 19 万人之多。

兴修水利工程。沂蒙地区水系发达，沂、沭河分别发源于临沂北部的鲁山和沂山南麓，由于流域多为山丘地带且历史上多无堤防，常常山洪暴发、河道决溢，造成洪涝灾害。特别是位于沂河与沭河交汇处的袁家口子一带，历史上曾多次因洪水暴涨，致使周边村庄尽成泽国，万余亩膏壤被淹没，大量群众流离失所。数百年间，当地土绅名流也曾几经筹划，修筑土堤，但缺乏根治措施，屡修屡决。1941 年 4 月，抗日民主政府在财政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动用民工 65000 人，奋战 3 个月，筑堤 5039 米，其中石堤 308 米，水患得以根除。同时，为解决沂、沭河的水患问题，自 1947 年始，山东省政府就开始制定沂、沭河治理方案，并于当年编制了导沭工程的初步治理方案。1949 年 4 月，第一期导沭工程开工建设。导沭工程分 10 期完成，共出动民工 84.24 万人次，累计完成土石方 3277 万立方米，用工日 3233 万个，占地 35953.7 亩，实现了让河水改道的壮举，大幅度减轻了鲁南、苏北地区的洪涝灾害威胁。

为了新中国——革命烈士纪念碑碑文敬读